

历史人口

远古至汉代人口数量变化浅析

· 林其宝 ·

一、人口数量的意义

人口数量问题,是历史人口学中最为复杂和最重要的问题。所谓复杂,是指远古以来至西汉平帝这一漫长的历史时期内,由于缺乏准确可靠的人口数量记载,致使很难对这一历史时期的人口数量作出精确的统计而一直成为历史之谜。从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开始,即使我国历史典籍中载有丰富的户口统计资料,但由于种种历史条件的限制,加之古代人口调查统计方法之不精,统计数字自然是不会准确的,仅仅是一种估计。所谓重要,是指远古以来的人口数量的增加或减少,直接影响着社会发展进程,特别是具有劳动能力和战斗能力的人口规模,对当时的部落、诸侯国和统一国家的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往往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因为在当时,处于生产力不高的情况下,人口数量的多寡是衡量一个国家国力强弱的重要条件之一。另外,人口是国家进行管理的基础,人口数量的增加或减少,直接影响到统治阶级的科敛赋税和征调徭役,因此,历代统治者对于社会人口数量的增加或减少都极为重视。历代的一些有识之士,对掌握人口数量的意义,也提出了很多很好的见解。例如,战国时代吴起就曾经指出:“强国之君,必料其民。”^①东汉末年的徐干,对掌握人口数量的重要性,有着更深刻的认识。他在其著述中指出:“治平在庶事功兴,事功兴在事役均,事役均在民数周,民数周为国之本。”^②所谓“民数周为国之本”,就

是说搞好人口数量调查是国家制定政治、经济政策的根本。他还说:“故民数者,庶事之所出也,莫不取正焉。以分田里,以令贡赋,以造器用,以制禄食,以起田役,以作军旅,国以之建典,家以之立度,五礼用修,九刑用措者,其惟审民数乎。”^③这里,他将掌握人口数量视为国家分配土地、制定赋税、规定俸禄、配备军队的依据,是统治者建立法度、治理天下的先决条件。把掌握人口数量的意义提到这样的高度,在中国古代是绝无仅有的。

我国是世界上最早进行人口调查的国家之一。中国历史上进行人口调查的确切记录始见于《国语·周语》所载的周宣王三十九年(公元前789年)“料民于太原”的记述中。自秦汉以来,相继建立了全国规模的人口调查制度,记载了不同时期和不同地区丰富的人口统计资料。这些制度对以后历代乃至近代的人口调查统计,都产生着深远的影响。现存的全国性人口数字记录,以《汉书·地理志》所载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的数字为最早,而且相当全面详细。

对于史籍所记述的人口数字,从绝对的意义来说,只是一种大约的估计,不具有什么很高的史料价值。但从相对的意义来说,这些不精确的统计数字,在一定的程度上,也能反映出一些真实情况。因为如果拿各个地区相

① 《吴子·图国》

② ③ 《中论·民数》

比较,就可以看出各地区的人口密度有很大的差异,而人口密度又是与当地的社会经济发展情况直接相关的。凡是经济发达的地区,其人口必然众多;反之,凡是边远贫瘠、经济发展落后的地区,则都是人口稀少之地。如果以一个地区的不同时期作比较,从其人口总量增加或减少的统计数字,可反映出该地区社会经济盛衰消长的变化情况。例如,从《汉书·地理志》和《后汉书·郡国志》所记载的各郡国的户口数目来看,西汉时期,人口密度最大的仍然是包括关中在内的“三河”(汉时称河东、河内、河南三郡的三河。相当今河南北部、中部及山西南部地区)地带及其附近区域;其次是巴蜀和淮河流域;江南还没有大量开发,经济落后,故人口亦比较稀少;而人口密度最小的,则是西北、东北和西南边远地区。至东汉光武初期,承天下大乱之后,人口锐减,关中和山东人口几乎十不存一;淮河流域的人口也没有恢复到西汉时的旧观;西北边远地区各郡,户不盈万,呈现出一种空旷荒凉千里无人烟的景象。相反,长江和珠江流域的人口,则有了显著的增加。可见,人口数量增加或减少的记载,对于确切了解和比较不同历史时期或同一历史时期不同地区的政治、经济发展变化,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二、人口数量增减变化的客观规律性

自远古至汉代数百万年来,就整个人口发展趋势而言,我国人口数量的增减变动,经历了一个由低到高、由高到低、再由低到高的不断反复的波浪型发展过程。这种变动过程,在重大的历史转折时期表现得尤为明显。从以下所引几段史籍记载就可以清楚地显示出来。

“禹平水土为九州,人口千三百五十五万三千九百二十三。涂山之会,诸侯承唐虞之盛,执玉帛者万国。……逮汤受命,其能存者三个余国,方于涂山,十损其七。”^①

“周武王定天下,列五等之封,凡千七百七十二国,又减汤时千三百国,人众之损亦如

之。周公相成王,人口千三百七十万四千九百二十三,此周之极盛也。”^②

此后,经战国争雄、秦之暴虐与楚汉相争,汉高祖定天下时,“民之死伤亦数百万。…方之六国,五损其二。”^③“至孝平元始二年,人户千二百二十三万三千,口五千九百五十九万四千九百七十八,此汉之极盛也。”^④这种人口数量增减的波浪型发展态势,对于我们深入探索各该时期的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将提供有益的启示。

就某一朝代的不同时期而言,人口数量的增加或减少所出现的波浪型发展亦随处可见。例如,在经过长期战乱之后的西汉初年,天下初定,户口稀少,死亡之余,十存二三。到了文景年间,经过长期恢复,“流民既归,户口亦息”,^⑤特别是经过文帝“劝趣农桑,减省租赋”,采取与民休息的政策之后,造成了“吏安其官,民乐其业,畜积岁增,户口寝息”^⑥的繁荣景象。至西汉末年,人口共有五千九百余万,是西汉人口最盛的时期。随之而来的是汉王室遭王莽丧乱,至东汉初年,人口大减,所余人户,十裁二三,致使很多地方空无人居,郡县无法“张官置吏”,遂并省了四百余县,吏职减损,十置其一。^⑦经过长时间的生聚繁殖,至顺帝时,人口由初叶的二千一百余万增至四千九百余万,至桓帝时,又增至五千六百余万,约为东汉初年的二倍半强。但不久即由盛转衰,从灵帝到献帝年间,遭董卓之乱,天灾人祸交相煎迫,“海内荒残,人口所存十无一二”,^⑧从而使东汉的人口数量由高峰跌入低谷。这种人口数量增减的波浪型现象,再次

① 《后汉书》志第十九,《郡国志》注。

② 《文献通考》卷十,《户口考·历代户口丁中赋役》

③ 《后汉书》志第十九,《郡国志》注。

④ 《汉书》卷二十八下,《地理志》。

⑤ 《汉书》卷十六,《高惠高后及功臣表》。

⑥ 《汉书》卷二十三,《刑法志》。

⑦ 参见《后汉书》卷一,《光武帝纪》。

⑧ 《通典》卷七,《食货典》

为深入研究人口的发展规律性提供了新的启示。

三、人口数量增减的原因

通过上述历史状况的展示,我们认为,造成人口数量增加的主要因素是:当天下盛平,人民生活安定时,由于统治者实行与民休息和一些鼓励生育的政策,人口便会通过自然繁殖的途径逐渐增长起来。例如,西汉到文帝时,据史载:“会天下新去汤火,人民乐业,因其欲然,能不扰乱,故百姓遂安。”^① 故此“自孝惠至文、景,与民休息,六十余岁,民众大增。”^②到了明帝时,也是经过了了几十年的恢复而有了类似的现象:“吏称其官,民安其业,远近肃服,户口滋殖焉。”^③ 此后至东汉末期,人口数量一直维持着上升的趋势,至章帝、和帝时,“齐民岁增,辟土世广”,^④ 民人归本,户口岁息”,^⑤ 人口数量由光武中元二年(公元57年)的二千一百万七千八百二十上升至和帝元兴元年(公元105年)的五千三百二十五万六千二百二十九。

人口数量的增加还与秦汉时代我国疆域的不断扩大与少数部族的内迁有着密切的关系。汉代至武帝时,武功极盛:北征逐匈奴,收秦故河南地,昆邪王来降,西辟河西四郡(酒泉、武威、张掖、敦煌),南平“三越”(南越、东越、闽越),东征朝鲜置四郡(乐浪、临屯、玄菟、真番),西北通西域统属三十六国(今新疆至中亚一带),西南服西南夷(今四川南部及云贵等省地),辖有“地东西九千三百里和南北万三千三百六十八里”的广阔领土。^⑥ 一些地处边缘郡县的少数部族相继内迁,仅永平十二年(公元69年)一条史料记载,即有“哀牢王柳貌遣子率种人内属,其称邑王者七十七人,户五万一千八百九十,口五十五万三千七百一十一。西南去洛阳七千里,显宗以其地置哀牢、博南二县,割益州郡西部都尉所领六县,合为永昌郡。”^⑦ 其他少数部族内属事例史籍上亦不乏记述,从而使人口数量大为增加。

造成人口数量减少的因素,主要可以归纳为自然原因(如自然灾害等)和政治原因(如战争、徭役等)两个方面。

远古至汉代,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限制,经济基础薄弱,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差,加之统治者的残酷剥削和奴役,任何自然灾害的发生,都可以造成社会经济的混乱和相随之来的人口大量死亡。据史籍载称:建始元年以来的二十年间,“群灾大异,交错锋起,多于《春秋》所书。”^⑧ 另一处史籍记载:“元帝即位,天下大水,关东十一郡尤甚。……齐地饥,谷石三百余,民多饿死,死而不葬,琅邪郡人相食。”^⑨ 同年,因郡国多困,“民大饥而死,死而不葬,为犬猪所食。”^⑩ 随着每一次水、旱、虫、蝗等自然灾害的严重发生,都将出现“人相食”、“白骨蔽野”,甚至千里无人烟、荆棘载途的凄惨景象。这种景况在史籍记载中连篇累牍,比比皆是,无怪乎有的学者在其论著中指出,一部二十四史,几无异一部灾荒史。由于自然灾害而引起的饥馑和疾疫,确实是造成人口数量减少的重要因素之一。

因战争、徭役直接导致人口的死亡,是造成人口数量减少的政治原因所表现出来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其对人口毁灭的程度较之自然灾害尤烈。例如,在商代,逮汤受命,由于各部族之间进行着残酷的争战和兼并,结果,其能存者仅三千余国,“十损其七”。^⑪ 本世纪初出土的殷虚甲骨文中,就有许多关于因战争的发生而出现“丧众”的记述,具体死亡人数

① 《史记》卷二十五,《律书》。

② 《后汉书》志第十九,《郡国志》注。

③ 《后汉书》卷二,《明帝纪》。

④ 《后汉书》卷四,《和帝纪》。

⑤ 《汉书》卷二十二,《礼乐志》。

⑥ 《后汉书》志第十九,《郡国志》注。

⑦ 《后汉书》卷八十六,《西南夷传》。

⑧ 《汉书》卷八十五,《谷永传》。

⑨ 《汉书》卷二十四上,《食货志》。

⑩ 《汉书》卷七十二,《贡禹传》。

⑪ 《后汉书》志第十九,《郡国志》注。

不详,但从参战双方的数量上看,参战人数有二、三千或四、五千人的,多者竟达万人之众。^①由此观之,双方混战结果,其死亡人数不在少数。在周武王定天下时,由于争战之激烈,翦商之后,仅存千七百七十二国,又减汤时千三百国,“人众之损亦如之。”^②至秦代,据史载:“秦始皇即位三十九年,内平六国,外攘四夷,死人如乱麻,暴骨长城之下,头卢相属于道,不一日无用兵。”^③另外,始皇帝还“遣蒙恬筑长城,东西数千里。暴兵露师,常数十万,死者不可胜数,僵尸满野,血流千里。”^④在秦末抗秦争战中,“楚军夜击坑秦卒二十余万新安城南”,^⑤且每攻破一城则“屠之”。楚汉相争时,楚项追击汉军;“至彭城,日中,大破汉军。汉军皆走,相属入谷、泗水,杀汉卒十余万人。汉卒皆南走山,楚军又追击至灵璧东睢水上。汉军郤,为楚所挤,多杀,汉卒十余万人皆入睢水,睢水为之不流。”^⑥两汉时期,残酷的争战有增无减,尤以西汉末年王莽之乱和东汉后期的董卓之乱为甚。诚如仲长统在其所著《昌言》之《理乱篇》中所概括论述的:“昔春秋之时,周氏之乱也。逮乎战国,则又甚矣。秦政兼并之势,放虎狼之心,屠裂天下,吞食生人,暴虐不已,以招楚汉用兵之苦,甚于战国之时也。汉二百年而遭王莽之乱,计其残夷灭亡之数,又复倍乎秦项矣。以至今日,名都空而不居,百里绝而无民者,不可胜数。此则又甚于亡新之时也。悲夫,不及五百年,大乱三起,中间之乱,尚不数焉。”^⑦可见,造成人口数量减少的政治原因更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四、远古至汉平帝元始二年人口数量的一些新见解

关于远古至汉代平帝元始二年期间的人口数量问题,始终是困扰着学术界的难题之一。对于这一难题的见解,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近半个多世纪以来,随着古代历史遗址的发掘和地下有关资料的发现,为学术界研究这一难题提供了良好的探索条件。不少专家、

学者遂依据新的考古资料进行深入研究,从而对“书策无存,无以考之”^⑧的远古至汉平帝元始二年期间的人口损益数量,发表了新的见解。例如,有的学者依据历史遗址的发掘资料,结合有关史籍的记述,认为夏初人口总数约略为240万~270万人;商初人口约为400万~450万人,至晚商大约增至780万人左右。^⑨对于战国时期,秦代和汉初的人口数字,学术界的一些同仁依据具体的历史实际情况,运用现代的一些最新计算方法,亦作了详细的分析和统计,认为苏秦张仪活动的战国年代有人口3200万人,秦初大约有人口2000多万人,汉刘邦时约为1400万人,至文、景之世,当时全国人口约为3120万~3250万人左右。^⑩

以上的一些看法,且不说他们见解可信程度如何、人口数字估算是否妥贴,但他们不依旧说,勇于探索,发表自己新的观点,对于推动这一历史遗留的不惑之谜进行深入研究,无疑是很有意义的。

(作者工作单位: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

① 参见《英国所藏甲骨集》第150片。

② 《文献通考》卷十,《户口考·历代户口丁中赋役》。

③ 《汉书》卷六十三,《武五子传·赞》。

④ 《汉书》卷四十五,《伍被传》。

⑤ 《史记》卷七,《项羽本纪》。

⑥ 《史记》卷七,《项羽本纪》。

⑦ 《后汉书》卷四十九,《王充王符仲长统列传》。

⑧ 《后汉书》志第十九,《郡国志》注。

⑨ 详见《历史研究》1991年第4期宋镇豪所撰写《夏商人口初探》一文。

⑩ 详见赵文林、谢淑君所著《中国人口史》一书第一、二章,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